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Overseas Ethnogra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海外民族志与 中国社会科学

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龚浩群：国家·公民·权利

康 敏：仪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与文化共同体

谢立中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Overseas Ethnogra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海外民族志与 中国社会科学

谢立中 主编

K18-53
X45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 谢立中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1435 - 5

I. ①海… II. ①谢… III. ①民族志—研究—国外
②社会科学—研究—中国 IV. ①K18②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9439 号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主 编 / 谢立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谢蕊芬

责任校对 / 李瑞芬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6

字 数 / 25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35 - 5

定 价 / 3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学术创新不仅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所在，而且也是一个教学科研机构的生命力所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恢复重建以来，同仁们就始终把学术创新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之一，力求在继承前人优秀学术遗产，以及学习、吸收、借鉴和改造当代海内外同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进行学术创新来提升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缩小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使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始终能够处于本学科发展的前列，为本学科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们已经有一批有一定原创意味的学术成果，其中有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本系（所）的标志性成果。此外，还有一批从学术创新方面来看富有潜力的研究成果趋于成熟，其中不少也有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标志性成果的可能。为了使这些具有一定原创性、标志性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示、积累、流传和检验，我们拟自 2010 年起编辑出版“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丛书，将这些学术成果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代表性文献（包括具有原创性和标志性的成果本身、反映这些成果学术或社会反响的相关文献以及对理解这些成果有帮助的相关文献等）收集起来，分辑出版。初步考虑每辑以一个专题为主，辅之以相关的文献，篇幅在 20 万字左右。本辑选编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

丙中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性工作的部分代表性成果。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迄今为止，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状况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来自书本、报刊一类的间接材料，而且多是由中国以外的他国人士所撰写的文字材料。由中国人（尤其是在学术观察方面训练有素的中国人）自己观察得来的材料少之又少。这不能不使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和普通百姓）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状况的了解和理解受到极大的限制。鉴于此，近年来，高丙中教授开始带领研究生到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进行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批虽然初步但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尚属初步性质，却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开始从本国的需要出发，运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海外世界进行实地性的考察。本辑选取了高丙中教授及其团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其中第一部分收入的三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第二、三部分则分两个主题具体呈现了该团队在海外从事民族志研究的部分成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专辑，不仅使高丙中教授及其团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能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希望借此使海外民族志的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动。

目 录

CONTENTS

人类学与国外民族志

3 /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高丙中
12 / 重新发现异邦	杨春宇
——近年来汉语国外民族志的发展	
27 /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他山之石”	周歆红
——透视“人类学德国研究”	

国家、公民与社会

49 / 国家·公民·权利	龚浩群
——泰国曲乡地方自治实践的民族志讨论	
79 / 身份认同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传统	张金岭
——源自法国社区研究的思考	
97 /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	吴晓黎
——印度教育领域一个复杂的个案	
112 / 一个公民社团的诞生、发展和延续	夏循祥
——以香港 H15 关注组为例	
151 / 种姓、阶级与地位	吴晓黎
——以南印喀拉拉邦为例	

175 / 平等竞争	杨春宇
——从少儿足球竞赛的架构看澳大利亚社会平等主义的再生产	

时间、空间与文化

231 / 民族国家的历史时间	龚浩群
——简析当代泰国的节日体系	
260 / 仪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与文化共同体	康 敏
280 / 厨房与厅堂	康 敏
——马来人的房屋设计所体现出的性别关系	
298 / 城市与市民内在关系的形成	李荣荣
——以美国加州悠然城为例	

人类学与国外民族志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重新发现异邦

——近年来汉语国外民族志的发展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他山之石”

——透视“人类学德国研究”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 社会科学的发展

高丙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提要：基于中国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响应时代号召的考虑，北京大学重点学科人类学把“建设面向全球社会的实地研究平台”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本文从纪念理福斯发表《托达人》这本民族志一百年着手，倡导进行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论述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双轨结构（一条轨道是学科，一条轨道是地区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海外民族志 田野作业 地区研究 学科建设

2006 年对于世界人类学界来说有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事件，就是理福斯（W. H. R. Rivers）发表《托达人》（*The Todas*）一百周年。理福斯是人类学学科化历程中第一个以自己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完成民族志专著（monograph）的人类学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西方人类学界会怎样纪念这部大作的百年贡献。但是，现代西方人类学以海外社会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已经积累了一百年的成果的事实强烈地激发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方式。有意识地到国外开展民族志研究，我们在当今形势下已经无可回避。

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在知识生产方式上有一个分工，它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论著由两种人分别提供，一种是由传教

士、殖民地官员、探险家、商人对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遗闻佚事进行记述，一种是由有专业修养的知识分子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理论概括。古典人类学的集大成者泰勒和弗雷泽都是依据庞杂的二手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这种不在现场甚至从来不到现场的人类学研究在 1900 年前后的几年里被改变了。从 1898 年开始，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 C. Haddon）率理福斯、赛里格曼（C. G. Seligman）等人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在澳大利亚同伊里安岛之间）周围对土著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与工艺、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实地考察，开创了学术研究者自身到实地调查的先例，并在 1901 年至 1935 年间出版了哈登主编的多人撰写的六卷本《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虽然对托雷斯海峡土著探险的集体考察时间很短，但是理福斯从中得到了锻炼，并有了对于一种新的人类学方法的信心。这种方法在当时被表述为对于一个民族或者地区的“民族志普查”（ethnographic survey）、“强化研究”（intensive study of a limited area），也就是后来流行开来的民族志方法。《托达人》对印度托达人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信仰、亲属关系以及与周边民族的联系进行描述的时候，展示了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新方法：到异国他乡的一个社区居住相当长一段时期（理福斯在印度的这个部落待了半年），进行调查时既要全面又要细致，以此为基础写成叙述性的著作，达到描述透彻、细节精确的专业水准。^① 理福斯的著作为其第一代学生发挥了示范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类学界已经有十多个有海外调查经验的人士所培养的学生分别到世界各地进行这种实地调查。^② 随着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 1922 年分别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以亲身

① Rivers, W. H. R., *The Todas*, Macmillan, 1906, p. v.

② Stocking, George,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 - 195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pp. 118 - 119.

实地调查为资料来源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普及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学的学科基础。

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发展比较成熟的英国和美国，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一方面是针对特定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研究，如非洲研究、太平洋岛国研究、南亚研究、中国研究、农耕社会研究、游牧社会研究；另一方面是以此为前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怀，如萨满教研究、馈赠研究、经济理性研究、社会组织研究。人类学的这种学科定位不仅使它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具有独特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立学科，而且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优秀代表：其一，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成为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除了与人类学相通的民族学之外，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乃至传播学都在做这样的民族志。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志既是一种文体，也是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其二，人类学用整体观（holism）看待社会，把一个社区当做微型社会来研究，包含关于对象的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本身就发展出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分支，俨然就是微型社会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三，人类学关于特定社会的民族志著作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积累了该社会的经验事实，提供了第一手的经验材料，使该国其他学科的专门研究有了一个共同而共通的经验资料基础。

所以说，国外社会的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学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奠定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实力的基础。这是我们今天纪念《托达人》发表一百年所要彰显的事实。我们从这个事实出发回应“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呼声，能够从中国人类学学

科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阎云翔教授、柏克莱校区的刘新教授，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教授，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光光亿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庄英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沛良教授、陈健民教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郭于华教授，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麻国庆教授和欧阳光教授、康保成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云南大学的何明教授、黄泽教授、马京教授和杨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张海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教授、翁乃群教授、色音教授、何星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等同仁交换过一些意见并得到诸位的教益。我和他们谈到了同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人类学当前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向”——以整个世界为实地调查的田野，而不再局限于以本国为田野。学界应该从理论和个案两个方面推进这种转向，并借此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单位内部也就人类学学科建设反复交换意见，达成了“建设面向全球社会的实地研究平台”的共识。确立这个发展方向首先是为了培养一代具有新的知识生产能力的青年学人，让他们有机会到国外我们关心的地方开展符合学科规范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长。我们相信，这种人才的增加以及相应成果的积累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都是有重大价值的。从应用方面来说，这是为中国与世界和平共处提供有关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系统知识，增强国人对其他社会与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国人开展跨文化交流的对话能力；同时从学科发展的方面来说，这将有助于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格局——中国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也开始以国外世界为对象，以此为基础，中国人也开始作

为独立的学术主体开展从自己的价值和需要出发划分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在国际上从事以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的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

人类学的学者和学生开始认真思考到国外进行田野作业的可能性和实施方案，斯其时也。从理顺人类学本身的定位来说，人类学视野和活动空间的内敛性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遗憾与无奈。中国的人类学前辈当然知道人类学是以世界而非限于国内为田野的。但是，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制约着人类学家的选择。其一，中国的国力（课题资助能力）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直顾及不到把资源投到耗费不菲却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国内急迫问题（如围绕温饱问题的物资生产与分配斗争）的人类学课题上；中国政府的外事机构没有设计过针对自己的公民在外国社会中进行自由行动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其二，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不利于学者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并长期伴随着外来入侵造成的众多生命的牺牲和“国耻”的不断累积，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过于敏感的。自尊与屈辱相纠缠的集体情感在缓和乃至超越之后才有利于学者到外部世界进行学术研究。国家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需要在国内用意识形态凝聚人民，分类并刻板地看待外部世界，就不会鼓励学术的“求真意志”。可喜的是，这些制约条件在过去几年发生了转变。一些学术课题的资助能够支持学者到一些国家进行一周年的田野作业了。学者和学生出国已经很方便了。中国的发展水平造就了民众比较自信和平和的对外心态，奠定了民众接受充满差异的真的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

关于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显然已经是中国人类学界日益急迫的知识需求。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和中国货已经扩散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

且急速地增加着占据密度，中国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里都纳入了大量的外来要素。这个格局在中国孕育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识需求，在国际社会则孕育着让中国学者积极主动参与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需求。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和对于外部世界的表述大致有三个形态。传统的中华帝国有一套获得海外经验、表述海外社会的途径（如朝贡体系、宗教与文化使者）和方式（史志、小说），统治者和百姓以此轻松自信地想象外部世界。近代以来，西方的器物 and 思想靠强力侵入中国社会，中国人以混合自尊和自卑、推崇和怨恨的矛盾心理想象他们的社会。现在，大批人出国做工作性的和休闲性的旅行，在国外社会获得丰富的个人经验。另外还有更多的人与“外事”、“外贸”、“外教”、“外企”、“进出口”发生联系。在集体的想象和个人的经验之外，以参与观察为基础了解外国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知识就成为国民越来越急迫的需求。在国家 and 政府的层次，无论是长期的国际战略还是短期和局部的外交政策，都有赖于人类学民族志式的对于国际社会的深入的调查研究。

国内 and 国际的学术发展也都需要中国人类学界的大力推动。国内一些相关的学科，如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在研究对象、议题上一直都是交叉重叠的。随着这些学科在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的趋势下有彼此分工、区隔的必要并成为学科发展的压力，人类学界把注意力转向国外社会、转向海外民族志，就成为一个选项。从西方人类学的立场来看，殖民主义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兴衰。^① 对人类学在西方作为权力和知识的双中心的历史中发挥的作用的反思，使西方学者单向的国外民族志

① Asad, Talal,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73.

田野作业陷入知识和伦理的困境。从合作和互惠的角度思考民族志的新的可能性,^①就成为国际人类学同仁谋求的一条解决之道。在知识上主动和被动的双方要合作,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的对立要转向互为主体。非西方的人类学家走出国门,到西方国家乃至世界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使过去人类学知识生产关系中的对象国也成为知识的主体。这是世界人类学的机会,也是人类文明健康、公平发展的一个知识条件。中国,一向作为民族志的田野,现在转变为民族志实践的主体,这应该是世界人类学振兴所需要的。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对象”不是容易成为“主体”的。但是,只要我们勇于开始,我们就会有无限的希望。

中国从“独立自主”到融入国际社会,许多学科的学者在讨论中国的市场转型、政治改革,但是没有给予必然与这些过程相伴随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以足够的重视。中国人类学能够进入世界,中国的社会科学才有机会成为当前世界的学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体制是一种双轨结构:一条轨道是学科(disциплиnes),一条轨道是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研究性综合大学在组织上有一个以院系为单位的系列,还有一个以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为单位的系列。前者以学术性的学科教育为本,后者以应用性的地区研究为务。教师大多兼具双重归属,一是归属某个学科(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二是归属某个地区研究(如非洲研究、中国研究、南亚研究)。这种双轨结构在运行上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学科系列有利于学术知识的传承、积累与创新,地区研究系列则便于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专门知识,也便于获得资源反过来为学术与学科建设服务。美国的学术繁荣固然得益于国家实

① Lassiter, Luke Eric, *The Chicago Guide to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力，但也得益于这一学科体制。这一体制其实不过是人类学学科特点的制度化和泛化：不仅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要到国外的一个地方去做，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涉及特定社会的时候也要扎进当地做实地调查，没有这种调查的知识生产是不能被接受的。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有一个大的发展，有必要借鉴这一双轨结构。整个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都要借鉴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开展必要的海外实地调查研究。“我要研究什么就亲自去收集相应的资料”，在独立自主性上和可信性上完全不同于“我能够找到什么（二手、三手）资料就做什么研究”。中国已经生存在国际社会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也需要借助双轨制证明自己也是以国际社会为背景的学术。

2004年12月，我们按照这种设想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通过学位论文答辩，郑杭生教授、杨圣敏教授、景军教授、郭于华教授、麻国庆教授、王建民教授、马戎教授等答辩委员针对该文，就国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发，并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问题。^①当时是学生答辩，不是老师之间的研讨会，对于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大家也只是点到为止。我现在就利用这个纪念人类学民族志专著（当然是“海外”民族志的专著）问世一百年的机会用文字来回应他们的意见。

我对国外民族志感兴趣，发端于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度重大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身份建构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多国的比较”。该项目是要通过对多个国家的公民身份的实地调查，来思考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而又如何建设的问题。我们还要借此机会提出学科建设的一个抱负：建设更规范、更健全的中国人人类学。规范要从博士生抓起，他们必须使用当地语

① 龚浩群：《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